

德國的統傳 學治政

■ 跡 陳 ■

政治學是門極古老而又最年輕的科學。它是一門古老的科學，因為極早的時候，政治即已被人視為研究的對象，用比較的方法將它作以系統的整理和分析(一)。它同時是門年輕的科學，因為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政治學成爲大學中一門獨立的科學爲時最晚，直到目前，學者們仍在孜孜於替這門學科的清晰面貌從事勾劃工作。

這種勾劃工作實際涉及的問題是如何替政治學尋找一種學科的主題(二)。政治學是一種實用的科學，基於文化背景和社會成長條件的迥異，它在不同的國家都有其不同的研究任務和方向，換句話說，在爲這門新獨立的學科尋找主題時，各國學者都有其特殊的着眼處。從這層意義看，戰後政治學中行爲的研究是一種純粹美國觀念的產物，而西德學者們在爭取政治學自立門戶的努力中則側重這門新學科學術傳統的發掘。如何認識和評價德國政治學的傳統及如何將這種傳統作爲新立門戶的學科的繼承基礎，這些問題已成爲戰後西德學者們熱烈討論的問題(三)。

政治學在德國學術界不是一個新鮮或陌生的觀念。早在中世紀晚期，德文的大學中的藝術學院(Artistenakultar)即已設有政治課程。按照當時的學制，這種學院主要在給予大學生一種基礎教育，對於每一個在學的人來說，不論他日後攻讀什麼學科，都必須先在這個學院完成分科前的教育。政治課程在這裡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只是一種哲學的前期訓練，和經濟學及自然史一樣，它只是道德哲學的構成部份。課程的內容和十三世紀以來歐洲其它大學大同小異，主要在敘述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及奧古斯汀的倫理政治論著及經院學派對這些論著的釋義(四)。

到了十六世紀，歐洲的政治及社會的基本形態有了急遽的改變。主權國家的日益興起導致了政治學實質上的逐漸革新。一些星然的政治理論家如馬奇維里、布丹、格羅秀士及霍布斯都是這個世紀裡的人物，他們的理論使得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學派的政治學說在傳統上的地位成了爭論的題目。新的理論是朝着兩個方向進行的：權力學說的興起使得政治和倫理不分的局面發生了動搖；另一方面國家學說也隨着世俗自然法的發展而成爲一種以統治機構爲主要內容的政治理論(五)。

但這些都是歐洲其它地區的發展。在德國，一切實際情況與中世紀晚期比較起來並沒有多少改變。這裡沒有主權國家興起，有的只是那種由貴族、僧侶及公民組成的中古社會制度。保守色彩還表現在十六、七世紀的大學政治課程上，和那種根深蒂固的經院哲學的亞里斯多德學說相比較，馬奇維里與霍布斯的理論在這裡的份量是微不足道的。在政治理論的發展上，除了像阿突修斯 Johannes Althusius 1557-1638 承受了當時歐洲反君主學說而在人民主權理論有所發揚外，實在很難找出創新的理論家；至少找不出像馬奇維里、布丹或霍布斯那樣卓越的人物來。

十六世紀的德國政治學雖然在創新上沒有成就，但是在傳統的理論方面却有了革新的進展。由於馬

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德國的神學和哲學的內在結構都受到了根本的衝擊。從理論和政治的關聯觀點來說，革新派的重心工作在於澄清亞里士多德理論的真實面目。

自從十三世紀以來，這位希臘哲人的論著一直受到基督教義的謹慎態度。他的倫理和政治學說不但受到經院派學者如 Albertus Magnus 和 Thomas von Aquin 的批評(六)，甚至在大學課程中，學生們除了對他原著精義的瞭解外，還要將這些學說拿來與基督教義作印證的工作。觸犯倫理神學趨勢的說法固然必須排斥，即使亞里士多德那種將政治變成一種目的學說[teleologische Lehre]的主張也不見容於教會的傳統，因爲自從教父時代以來的數世紀中，倫理學已演變成理論的玄學和神學。

但是使得經院學派對亞里士多德學說採取謹慎態度的癥結還是在兩方面持論的南轅北轍。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可以看成爲政治學的一部份，因爲在這位希臘人的看法裡，只有在城市國家中，每個無助的個人才能達到他追求幸福的目的。這種城市國家是集各種生活形態於大成的團體，摒棄了它，則沒有人能夠完美幸福地生活。在這個理論下，政治和倫理是處於一種雙邊有利的關係上，即對國家有益的事，亦即有益於個人。從這裡亞里士多德發微了他的「人的科學」，也是從這裡他將倫理和國家的討論看成爲不可分割的問題。

這種倫理和政治的相聯關係在中世紀基督教的傳統中是不存在的。政治不再是那種從個體經由家庭到公民團體的倫理追求；而塵世的幸福之上還有極樂的福祉，好的生活之上還有永恆的生活。如果說城市國家在這裡不再是完美生活的關鍵，那末在倫理、政治和經濟之間便也沒有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目的的關係 teleologische Zusammenhang 了。

這些存在於希臘哲人與基督教義間的基本歧義使得中世紀以來的經院學者一直從事於亞里士多德學說的精挑細選工作，以謀求與基督教義的符合。

十六世紀基督教改革運動對政治學的最大貢獻見之於梅蘭赫吞 Melancthon 對倫理的新釋義(七)。這位被稱爲「德國先師」Praeceptor Germaniae 的馬丁·路德同路人將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從經院哲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將哲學的倫理和神學加以廓清和作出分野，從此實用哲學不再是神學的附屬。在它的發展史上，政治學第一次達到了和神學爭取平等 Emanzipation 的目的。

梅蘭赫吞對亞里士多德學說的肯定在十六、七世紀當然也被他同時代的德國學者所反對。溫拉托利窩士 Venatorius·卡利克斯特 Calixt 萊因全 Reinking 希望將新教的倫理建立在神學的基礎上，色肯多夫的「基督國家」[Seckendorf: Christenstaat 1626-1629]也就是這方面的代表著作，但是這些努力都是徒然的。亞里士多德的倫理與政治從梅蘭赫吞時代起在德國大學裡的地位隨着時日日益鞏固，從十七世紀開始到康德爲止，政治學在大學中有固定而獨立的講座 Profession Ethices Vel Politices。但是這裡所謂的政治學是與倫理不分的，這種不分的局面直到十八世紀政治學在德國別開蹊徑後才告結束——和英美大學中的政治學直到現代仍視爲是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經院學派道德哲學的延續相比較，德國當時的政治學已經算是走在前面了(九)。

